



明代词史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i in the Ming Dynasty

余 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明代词史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i in the Ming Dynasty

余意 著

明
词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词史/余意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1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5111 - 9

I. ①明… II. ①余… III. ①词(文学)—词曲史—中国—明代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2088 号

书 名 明代词史

MINGDAI CI SHI

著作责任者 余 意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5111 - 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24.5 印张 431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总 序

在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都堪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山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她的历史与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山大学(初名广东大学)同样悠久。鲁迅、郭沫若、陈中凡、方孝岳、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董每戡、王起等名字让我们回忆起来充满着自豪感。

然而,对后人来说,学科辉煌的历史与丰富的遗产同时也是压力。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固然占了“便宜”,但也像是站在海拔极高之处,每一步攀升都异常艰难。仰望前辈,如何既继承学术传统又有所发展,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当今,“独创”二字已经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流行语。不过,各个领域不同,不同学科有异:有些贵在创造发明,有些偏重发掘发现。有些可能是“独创”,有些则只能是“独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似乎很难以创造发明自诩;形态上的“新”与“旧”也难以用来判断学术价值的高下。所谓“创新”,未必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抛弃。按照清代学者纪昀评点《文心雕龙》的说法,在历代文坛上,“新声”可能成为“滥调”,“旧式”也可能成为“新声”。新与旧不是绝对的,是会互相转化的。在传统断裂的时代,挖掘与发现传统文化资源,也是颇有价值的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文体学就是传统的学术资源。“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中国文体学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在文体学方面已经相当精深而自有体系,此后的文体学可谓久盛不衰。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益式微,甚至被人所淡忘。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观念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近年来,文体学研究更是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和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

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以中国“文章学”的观念来“发现”、诠释和演绎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套用西方文学分类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这一兴盛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意义,它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回归本土与本体,并不意味着满足于回归到“旧式”那里去。我们强调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同时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现代意识。西哲曾云:“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虽然,中国文体学之复兴,为“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作为“新声”的“旧式”已经完全不可能与古代的文体学相同。我们要站在21世纪的学术高度来研究中国文体学,回到中国文体的历史语境,但又不仅仅是要回到刘勰等古人的理论,同时必须具有当代的学术意识,反映出当代的学术眼光、学术水平与境界。

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受到学界认可的学科方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就是近年来我们凝聚力量、重点建设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本学科影响最大的方向之一。同仁们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发表了大量论文之外,还撰写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为了及时反映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是开放与持续的。作者除了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还有其他高校教师与学界同仁。所收成果以中国文体学研究为重点,兼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我们希望能不断地吸收中国文体学研究成果到本丛书中来,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发展。

吴承学

2010年12月于康乐园郁文堂

序

余意教授《明代词史》即将付梓,问序于我,虽因冗事繁杂而稍有犹豫,但还是欣然应允,因为有话要说。

先要说的是私“恨”。恨从何来?羡慕忌妒恨也!对于明词研究,我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留意明词,是在上世纪末。1996年,应著名版本学家杨成凯(林夕)先生之约,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点校王昶的《明词综》,次年又应约完成《兰皋明词汇选》的校点。随后,我和友人黄文吉教授发现长期湮没无闻的《天机余锦》尚存于台湾,又联手校点整理,也交给辽宁教育出版社一并出版。点校整理完这三本书,就觉得明词这个荒芜冷清的矿山大有开发的价值,但没有腾出手来,更确切地说,是没有下定决心着手进行系统的探究。2004年《全明词》出版后,我又做过补遗的工作,发表过几篇论文,但始终停留在文献整理的层面,没有沉潜下去对明词进行系统的理论观照。

余意博士则不同,从2004年做博士论文开始,就一头扎进明词研究,既做文献整理,也做理论阐释,先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明代词学之建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如今又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词史》,十年之内,完成两部明词研究的力作,成为明词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中坚人物,实在令人欣羡!欧阳修见苏轼之后,曾感叹“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我不能跟欧公同日而语,却有类似的“影响焦虑”。近年来我在明词研究方面了无斩获,日后明词研究者“更不道着我也”。不过,这次余意给我机会,让我写此序,得以托名卷首,日后言明词者,虽“不道着我”,却能透过余意此书而“看着我”的名字。如此想来,便转恨为喜。

再要说的是“公”喜。所谓“公”喜,非一人之私喜,乃学术共同体之同喜。作为词学研究共同体之一员,一为明词研究之进展而喜,二为明词研究之得人而喜。

在词学研究的现代进程中,受着“词亡于明”的传统观念和文献整理滞后的双重制约,20世纪以来的明词研究,相当冷清,虽然有关明代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并不鲜见,但整体观照和系统考察的成果却寥寥无几,直

到2002年张仲谋先生推出第一部《明词史》，我们才得以了解明词的整体面貌和发展历程，其开创之功，业为学界所重。

余意新著的《明代词史》，绝不仅仅是明词研究成果量的增扩，而是标志着明词研究实实在在的质的进步。随着近年来明词文献整理的推进，特别是2004年《全明词》和此后《全明词补编》的相继出版，明词研究的基础较之以前大为拓宽，不仅读取文本更为便利，认知明词的发展全貌、了解明词的发展过程也有了更充裕翔实的文献。因而《明代词史》所观照的明词全景较之《明词史》就更为周全丰富，对明词发展历程的考察也更为深入细致。《明词史》认为明词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而《明代词史》则提出明词的发展应有五个时段的变化，又极具创意地指出明词发展的大势有如“√”烟斗状，前平中低后高。这一结论，既有客观的词人词作数据作为支撑，也有作者主观的洞察与思考，发数百年未发之秘，新颖而令人信服。《明代词史》对明词发生发展的文化土壤、明代词人的角色身份、明代词人写词的动机目的、明词的特色和价值等也都有全新的体认和揭示。如说：“进入明代，中国古代文化所可能孕育的文体都已经产生，诗文自是传统士人不能舍弃的文体，而曲、小说等得到普通大众的青睐，词处于二者之间，既没有得到士人倾情投入，也没有完全放弃，因此要想产生非常伟大的词人几乎是不能的。的确，明人词存在着一些相关问题，然无名家、有佳作；以绘画、书法等艺术家甚而消费清雅脱俗趣味的山人群参与词的创作，客观上为词提供了新的趣味与表达可能；明人词风格多样，不主一格，注重小情小意，讲究情趣智性，与清代以来的词体观念有相当的距离。诸如此类，应该都是明代词的特色以及价值。”类似这种切实中肯的会心之论，书中所在多有。

20世纪以来，明词研究虽然成果有限，但每个世代总有学者默默耕耘。20世纪20年代，赵尊岳先生遵乃师况周颐之命，汇辑《明词汇刊》，为明词研究奠定了初步的文献基础，成为20世纪以来明词研究的第一人。21世纪初，饶宗颐、张璋先生先后接力编纂、穷十数年之功而成的《全明词》出版，为明词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文本，推动了明词的研究，功不可没。近十多年来，明词研究的作者队伍逐渐壮大，其中张仲谋教授最为突出，他不仅致力于明词研究，而且成果量多质高，他的《明词史》是拓荒之作，2013年推出的《明代词学通论》，系建构之制，极富学术含量。他俨然成为当下明词研究的领军者。张仲谋之后，明词研究又得一人，即本书作者余意教授。据统计，在新世纪明词研究作者队伍中，余意研究明词的成果量，仅次于张仲谋而位列第二，无论是就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品质而言，余意

都堪称明词研究新生代学者的翘楚。明词研究,后继有人。我作为词学研究的同道,不禁喜而笑,恨不能洗盏更酌,浮一大白,为之庆慰。

我跟余意教授交往有年,他读博士期间,就常有电邮来往,交流明词研究的心得与进展。2006年他博士毕业,我评议过他的博士论文,此后交往日密。特别是《明代词史》的成书过程,每个阶段我差不多都有了解。他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之前,我读过他的申请报告,就研究的思路提出过建议。书稿完成后,他又给我审读,我也提了些修改意见。如今此书的修订定稿,较之初稿,面目大是不同,当时的乱头粗服,如今已是丰容靓饰,学术纯度和精度大增。我既为明词研究事业的进步而欣喜,也为余意个人的学术进步而欣慰。故乐为之序。

王兆鹏

2014年12月18日于珞珈山麓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主编：吴承学 彭玉平

第一辑

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

林 岗《口述与案头》

何诗海《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

刘湘兰《中古叙事文学研究》

第二辑

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

许云和《乐府推故》

林 岗《明清小说评点》

孙 立《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唐雪莹《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

第三辑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戚世隽《中国古代剧本形态论稿》

第四辑

蔡宗齐《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

吴 晟《中国古代诗歌与戏剧互为一体用研究》

李光摩《明代八股文形态研究》

余 意 《明代词史》

目 录

序	王兆鹏
绪言:关于明词	1
一、明词发生的文化土壤	2
二、明词的特色与价值	7
三、明词的发展历程	11
四、明词的地域性	16
五、“明代词史”的含义与撰述	21
第一章 元明之际词坛:局部的繁华与消散	26
第一节 词人的聚与散	26
一、词聚东南:元末词坛格局	26
二、明初文化生态与词势渐散	29
第二节 乱世风雅与承平羁旅	32
一、乱世中的风雅与词	32
二、承平时的羁旅与词	40
第三节 词人儒林化和艺林化	45
一、儒学世俗化与词人儒林化	45
二、感性主义传统与词人艺林化	52
第四节 承泽两宋与拟议少变	59
一、唐、宋词的流光余彩	60
二、复古文学思潮与词之拟议风气	66
第二章 永乐一天顺:词坛衰敝下的两种势力	70
第一节 词坛衰敝论	71
第二节 阁权高涨与词	79
一、明皇族词	82

二、馆阁词林的词	90
第三节 潜伏的南方意识与词作	102
一、地方名景与词	103
二、江南的词学活动及马洪的词学史意义	109
第三章 成化—正德:士林分化与词学渐兴	118
第一节 词学渐兴之势	119
第二节 吴中风雅与吴中词人词	123
一、“吴中风雅”论	123
二、吴中风雅与词的创作	130
三、吴中风雅与词学特征	147
第三节 阁权渐弱与词	151
一、应俗之景	152
二、展示风雅	156
三、自抒其情	159
第四节 复古派的词及词学观念	170
一、复古派所作词检索	171
二、复古派作词缘起与词风	173
三、复古派诗文理论与词学观念	179
第四章 嘉靖—隆庆:词体探索与多元创作	183
第一节 复古思潮下的词体探索	183
一、复古之古与词的起源	184
二、复古之的与词体体性	188
三、复古之统与词学谱系	192
四、复古之径与词的创作	195
第二节 词学家陈霆、张缜的词学与词	199
一、陈霆的词学及词	199
二、张缜的词学及词	206
第二节 以夏言为中心的词人群及词风	214
一、以夏言为中心的词人群之形成	214
二、夏言词的另相	220

三、群内词人词及其多元化词学特征	225
第三节 贬居云南的杨慎词与词中“游记”体	231
一、杨慎的词学研究	231
二、作于云南的杨慎词	235
三、词中“游记体”	244
第四节 文徵明与吴中词人群	249
一、自适雅洁的文徵明词	249
二、围绕文徵明的词人群	255
三、文徵明外围的吴地词人	259
第六节 明词中的“边塞”风	265
一、明代边塞与边塞词创作格局	266
二、明代边塞词人考察	269
三、明代边塞词的主体意识及词作风貌	272
第五章 晚明：词坛生态与词学中兴	280
第一节 群体性生态：家族、郡邑、结社	282
一、家族与群体	282
二、郡邑与群体	288
三、社集与群体	292
第二节 山林之趣、声色之娱与词	295
一、感性主义的泛滥	295
二、山林趣味与词作	297
三、声色娱乐与词作	309
第三节 女性词人之群体及其词境拓充	314
一、女性词人创作：从个体独白到群体书写	316
二、名士化：晚明女性词创作的群体行为及其特质	319
三、女性词之新境界及词史意义	321
第四节 党争、国变与忠烈词	327
一、嘉靖时期的忠烈词	328
二、国变前的忠烈词	331
三、国变后的忠烈词	337

第五节 词:走向清代	347
一、清初:群体生态继盛	347
二、世变与词变	350
三、清初的明词接受	359
余论:有关明代词史演进的几点说明	365
参考文献	368
后记	377

绪言：关于明词

词萌生于唐,风行于两宋,衰于元,亡于明,中兴于清,这是清代以来关于中国千年词史的“经典”描述。当今词史研究在研究格局方面赓续古人所划定的框框,词研究重点落在唐宋与清代两头,至于作为“衰、亡”的元、明,特别是明代词的研究,投入精力不多。然而,如以古人简单笼统的描述继续统治今天的研究思维,其结果无疑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为业已出版的《全明词》“共得词家一千三百九十余人,词作约两万首”^①;《全明词补编》在此基础上“补编所收词人达六二九人,词作五〇二一首(含存疑词五十首,残词或句七则),其中《全明词》未收词人四七一人之词作三〇七六首,已收词人一五九人词作一九四五首”^②,作词总人数达 2019 人,词作总量高达 25000 多首,可谓参与人数众多,作品量大,且参与阶层“上自深宫,下逮韦素,家喻户晓,不可谓非盛事”^③。面对如此大量的词人、词作,只用“亡于明”一语加以空白化,进而无视,带来的结果是无法真正理解明词以及千年词史的演进进程。正如朱彝尊所说:“然三百年中,岂无合作?当遍搜文集,发其幽光,编为二集,继是编之后”^④,认为明词有深入认识的必要。民国时期整理过《明词汇刊》的赵尊岳也指出:“然若就词学而言词,则前承宋、元,继开清代(清初浙派,词学极盛,大都均循明季之遗风)。作者更仆,越世三百年,又岂可漫加鄙薄。”^⑤越世几近三百年的明词不可鄙薄,作为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词史更不能忽视。词产生于历史、发展于历史中,理解词的成就或问题,应该将其放置于历史中进行,对于明代词,应作如是观。即使明词存在问题,也必须在历史中解释其文体。不理解词在明代的历史情形,就无法理解明代词的存在状态,自然也无法理解明代产生的词作。另外,文学价值与文学史的价值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同一性,因此即使明词之不佳,也不能等同于明代词史的无价值。明代词史必须得到充分认识,因为放眼千年词史,缺少了明代的

① 《全明词·出版说明》,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

② 《全明词补编·后记》,周明初、叶晔《全明词补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③ 赵尊岳:《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④ 朱彝尊、汪森编:《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⑤ 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明词汇刊》。

三百年,词的历史面目将是残缺的。

一、明词发生的文化土壤

一般来说,消费决定生产。唐、宋时代的音乐歌伎制度以及普遍存在的音乐消费无疑促进了词的繁荣。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同时建立在歌伎制度上的歌舞艺术的词已经让位于传奇等戏曲艺术,明人的文化消费主流自然让位于戏曲。此情此景,词这种盛行于前朝的古代文艺样式既不具有现实的利益攸关性,消费的市场潜力看似也不大,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作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认识创作词的文化主体:词人与当时的文化之间是何种寄生关系,因为词首先是文化的存在物,是文化借助于文化主体形之于外的体式。

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特别是明代士人的人生选择出现多元化,有的选择以艺立身,有的选择经商,有的醉心儒术、希望从政等等,如大致按照中国传统仕与不仕进行二元划分的话,选择基本仍是两大趋向,其一幽处山林,其一高居台阁,然有时二者之间也会发生变化,明代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所谓的幽处山林与高居台阁,并非都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式崇高的理想信念,山林与台阁并非与前代那样具有明显的意识冲突性,而更多带有各自生命禀赋完成的意味。山林与台阁,不仅仅是出处选择,在文化意义上更代表了两种美学趣味,明初宋濂《汪右丞诗集序》曰:“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非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①,在明代诗文实践中,有时高居台阁者偶尔展现山林趣味,幽处民间者的作品中也不乏台阁之气;作词者同时也是诗文创作者,因而山林与台阁两种创作模式与趣味在明词中也比较明显。首先看幽处山林者词的发生情况。元末明初,谢应芳(1296—1392)、邵亨贞(1309—1401)、倪瓒(1301—1374)、顾瑛(1310—1369,又名顾德辉、顾阿瑛,字仲瑛,号金粟道人)以及高启(1336—1374)等于地方结社,互相唱酬,或因景物感怀,或忧时伤乱,或迎来送往,或题写园林绘画,词与一种雅致脱俗化的艺术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些人中如倪瓒终身不仕,主要从事绘画与诗艺,日常交往者多为隐约乡间、清雅脱俗之士,如其词《折桂令·拟张明善》之“张明善,名择,湖南人,以晦迹擢江浙提学,今谢病隐居吴江”^②;顾瑛在元末情形更为张致,经常在自家园林玉山草堂宴集四方士人,于其中吟诗作词,并将作品编辑成册;邵亨贞作词,有一种情形如“苏昌龄过曹云翁贞溪故居,赋词致慕藺之感。

① 宋濂:《汪右丞诗集序》,《文宪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② 王逢:《梧溪集》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幼文来致其意,求次韵入卷”^①,可见曹幼文有将经过他家的文化名人的诗词作品汇编成集的意图。词对于创作主体而言,与诗、文、绘画等一样,都是艺术形式的一种,当士人集会于一处,作词成为艺术素养全面的士人必备的能力之一。另一方面,民间对于词的需要也给词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正如上面已经提到,顾瑛将名士的词作编入集中;曹幼文将名士题赠私家园林的诗词整理成卷,说明这些活跃于地方的文化名人得到了民间的认同。元末明初形成的这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一直在江南吴地流传,到明代中期,江南地区出现了影响更大的文化名人如沈周(1427—1509)、唐寅(1470—1522)、祝允明(1460—1526)、文徵明(1470—1559)、徐祯卿(1479—1511)等,特别是沈周与文徵明,不仅影响艺坛,更以其立身处世的方式影响到当地士风。他们的画作与诗词受到了时人的追捧,他们以诸如绘画等艺术形式传递着词的创作方式。同时不得不提到的是朝廷的高官大僚,或失意,或致仕回归,堪破世尘,典型如徐有贞(1407—1472),聪颖过人,经历土木堡之变的朝廷变局,是明英宗复辟的主要参与者,政治失意后回归家乡苏州,广建园林,大宴宾客,以词遣兴。又如杨慎(1488—1559),因大礼议事件被贬云南,虽然还是朝廷命官,实已被废置,于是他在山水享乐生活中消磨余生,词也基本作于这种情形。悠游林下,山水清音,自然雅致。居于山林写词,退隐田园开始作词,这反映了明代词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士人追求艺术化生活的结果。晚明时期,这种以词为艺事之一的进一步山林化,特别是山人群体的出现,如陈继儒(1558—1639)、施绍莘(1588—1640)等,将清雅的趣味贯彻到日常生活,词因而参与表达这些趣味。整个来看,明代幽居民间的士人多坚持一种艺术趣味,这种艺术趣味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呼应,因而词成为艺事之一,也是表现艺事以及趣味的载体之一。因艺术追求而产生词作,这是词能够产生的文化土壤之一。

再来看台阁以及官员层面。元代,“九儒十丐”,儒士摒居于下僚或草泽之中,多与幽居民间的其他士人交往频密,也创作了一些词作。元末明初时期,词人一方面艺林化,另一方面儒林化。所谓儒林化,即词人多以儒立身并从事于儒业,虽身处草泽,与普遍的追求感性生命趣味的山林之士交往,但他们的词中经常流露出世俗儒家的价值观念。朱明立国,以理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儒生宋濂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并以其文学风格典型代表了官方的趣味,词作中世俗儒家价值观念与王朝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合一:明洪熙、宣德二帝能够作词,在重大节日时常有君臣唱和,充朝廷备问的台阁大臣们应

^① 邵亨贞:《木兰花慢》词序,《全明词》,第52页。